

笔谈

罗谷
文贯中
史桔
夏明
盖思德
李少民
乔山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1期
2024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国经济困境： 原因、出路与政 治意蕴

编按：中国经济曾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持续增长了几十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逐年下降。今天，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中国经济不但雄风不再，而且“徘徊在一场危机的边缘”（保罗·克鲁格曼）。企业家普遍对未来没有信心，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焦虑、失望状态。

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从政策、政治、结构上看，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活力？经济的下滑可能有着怎样的政治含义，是否会导致政权危机和民主转型的契机？《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以下笔谈。



罗谷（Dexter Roberts，蒙大拿大学莫林和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中国事务主任）：中国政府的传统刺激手段，对其苦苦挣扎的经济似乎正在失去作用。政策制定者可以向市场注入更多现金，2023年12月15日，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800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净贷款，是预期的两倍；央行可能还会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利率。但这些措施不太可能扭转经济颓势。因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金，而是更重要的、如今十分匮乏的东西：信心。

家庭正经历着信心的崩溃，这与疲软的就业形势有很大关系。今年早些时候，当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20%时，中国政府停止公布这一统计数据，随后又命令分析师停止对经济发表负面言论；显然这是掩耳盗铃：假装问题不存在，问题就会消失。但是，由于年轻人和其他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他们的信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这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深深

担忧中可见一斑。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打击了人们的信心。中国人拥有的公寓约占家庭财富的90%，房价下跌造成了负财富效应（negative wealth effect），打击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多年来信心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挫伤：当人们看到日子不好过时，就不会打开钱包消费。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越来越令人担忧。这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长期以来的目标——让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不稳定的债务转向更多地依靠家庭消费——不会很快实现。

正如我在*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中文版为《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所写，若实行某些政策改革，有助于刺激信心和消费的激增。例如，改变二元土地制度，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像城市居民一样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利；开始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结束数亿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获得与城市居民类似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据人口学家蔡昉估计，农民工的平均消费比城市户口的居民少近四分之一，相当于2万亿元（2810亿美元）的消费损失，约占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认真准备好废除户口、二元土地制度，或改革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

与此同时，无论是要求更多公司成立党委、迫使企业专注于特定行业或市场，还是以莫须有的腐败罪名将公司老板关进监狱，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倾向于干预商业，这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信心。信心的缺失反映在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急剧下降，2023年上半年下降了0.2%，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却增长了8.1%。现在，许多中国富豪开始用脚投票，跑到其他国家定居并获得国

籍，其中日本和新加坡是首选。

直到最近，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只知道经济在不断发展，并确信他们的生活必然会越来越好。打工者们相信，在工厂、建筑工地或城市街道上从事艰苦而危险的工作最终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为家庭赚取更多的钱。同样，1999年中国修改宪法，承认民营企业家在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民营企业家就认为他们在中国只会受到更多欢迎，可以自由地赚钱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场信心危机。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以及中共领导人的信任，仍需密切观察。（滕彪译）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1997年，世人对东亚奇迹一片赞扬声中，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预言，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理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是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话声未落，东亚陷入金融、经济危机。为了理解何为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先理解何为经济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它们分别为1)：增加资本、土地、劳动三大生产要素的投入通常能提高产出，但随着投入量增加，每单位新增投入带来的产出增幅会逐渐减少。2)：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要素质量，降低投入/产出比，使等量投入有更多产出。3)：提高产出也可通过制度变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例如，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体系。第二项和第三项都能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被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将第一项称为通过增加投入获得粗放型的成长。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东亚经济体已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本土科研投入则严重不足。无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获得增长源泉，只能实现粗放型增长。它们偏偏资源贫乏，只能要求民众节衣缩食，增加储蓄，以增加资本投入；却引起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只能高度依赖出口。它们的人口也十分有限，只能鼓励工人加班加点，以增加劳动投入，但工人因此而难以提升人力资本。克鲁格曼看到这些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日趋枯竭，得出危机必将来临的结论。

身处东亚的中国不但成为例外，还获得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原因如下。中国是人口和幅员大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巨量闲置要素加上巨量的外资流入，为中国提供了第一种增长的终极源泉。期间，中国加入WTO，有机会分享世界市场和国外科技知识，使中国得到增长的第二种终极源泉。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转型提供了经济增长的第三种终极源泉。三种源泉一起发力，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

今天，三大源泉日趋枯竭。作为第一源泉，外资流入日趋减少，民营企业丧失信心，不愿投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躺平化，劳动力丧失活力。农地污染，城市土地过度开发，房市空置率上升，农民和农民工受到购买力和户籍的限制，无法成为城市化的天然接盘手。作为第二源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要依靠抄袭外国科技，本土科研缺乏内生活力，而发达国家已决心切割和中国的高科技合作。从第三源泉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已束之高阁，改用以党代政，架空市场，阻止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面对增长的三大终极源泉的枯竭，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自然做出十分悲观的判断。中共一直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面对经济下滑，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这为民主转型提供难得的契机。

史桔（笔名，经济学者，现居澳门）：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三十多年快速增长，并在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由于中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性困境日益严重。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维持了中国两位数字增长的幻像。但纸毕竟包不住火，随着胡温时代的离去，中国经济增长已成强弩之末。近十余年来，在政治倒退、国进民退、战狼外交、疫情封控以及对民营企业巨头的强力打压下，中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全面性危机。

分析中国经济形势需要用数据说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因为去年受疫情影响，基数低，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2023年1月一路下滑，到6月份同比已经0%，事实进入通缩状态。从社会零售销售总额看，从4月最高点18.4%，开始同比增速迅速下降，6月的同比增速低至3.1%。综合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0.4%。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看，对去年疫情的反弹，一季度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二季度全部都处在收缩状态。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降幅总体趋于收窄。前三季度，全国PPI比上年同期下降3.1%。有业者说，这是制造业的“至暗时刻”。

以上数据分析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了动力。目前中国投资、房地产、外贸出口等几大动力引擎乏力已是不争事实，货币政策作用日渐式微，导致社会消费总量疲软，总体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中国经济的衰退与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密不可分，因为中国经济正是因为

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而快速增长。但十余年来，中国的“战狼外交”“引领世界”导致四面树敌，中国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使得中国在双方经贸关系上受到极大限制，尤其在高科技等方面受到严重抑制和打击。在国际产业链重组的情况下，大量外企从中国撤资、转场。欧盟本来是中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伙伴，但因为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对此所持的立场迥异，从而使欧盟各国家相继调整对华经贸政策。目前的态势是，全球经济体系处于重新构建新的经济“群”时代。从美洲、欧洲、亚洲、印太、中东等地区，都有新的经济体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经济体（如CPTPP）的新规，并不接受中国加入。毫无疑问，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会严重影响今后世界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发展路在何方？我认为需要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政治上改弦易辙走向宪政民主，建立法治国家；经济上建立充分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外交上崇尚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这些改革既不同于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与当今中国的政策和价值追求背道而驰，但别无选择。



夏明（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和史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1989年中共政府对平民的屠杀（包括拉萨三月屠杀、“六四”天安门屠杀和后来在成都等地的开枪和全国大规模处决）成为未来三十年权贵资本主义的起点、基础和特征。把中国政治经济的形态概括为发展型专制（较好的状态）、市场列宁主义、新权威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中国（共）合股公司、后极权主义、完美专制，或其他任何一种称呼，都离不开它与政

权的高度联姻。它的背后是由国家、进一步讲是由政权力量、具体讲是由刺刀支撑的，而且这把刺刀还滴着鲜血。以此为中心，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合成一个庞大变形金刚。屠杀的心理震撼给政权带来了稳定红利包括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扩展了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了中共寡头一个镀金时代。

但中共与市场体系的部分媾和，打乱和重组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撕裂了过去简单化的工农兵板块，并造就出一个日渐庞大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阶级冲突开始困扰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理论上、试图代表全民利益却无力代表工农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疫情期间滋生的多重危机的困扰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原因何在？

中国经济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还是政治经济，其危机源于结构、政治、政策和领导人。结构性原因首先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政治上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党专制转型到寡头体制最后滑进个人集权独裁，与经济基础产生冲突并出现国家吞噬社会、经济市场的后果。政策失败更是全方位的：户籍制度长期难以废除、政府财政软约束无法终止、国家金融、产业等政策偏向国营企业并歧视掠夺私营企业、对内维稳和对外逞强的先军强兵、反腐成为政治清洗并带来嫉贤妒能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等等。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蒙代尔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下选择了经济决策自主、固定货币汇率和资本管制，所以，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外生引发型的几率要远远低于内生型。当下中国的经济危机也主要是内生型的。但由于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误判、拥抱普京的欧亚主义、幻想独立自主、倚重内循环并和美国

及其盟国对立闭门营造“大而全”，造成了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无论是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条的重组，还是印度的崛起、印太战略带动出的印太地区经济繁荣框架以及香料走廊（印度-中东-欧洲）的构想，都在资本、技术、市场和人员流动上排斥中国。这只会使得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受损、竞争优势降低、产能过剩更加恶化，面临的困难雪上加霜。

这个危机的实质是什么？从危机本身来看，中国遭遇的经济危机是财政约束泛滥、政府滥发货币、地方政府财政依靠土地和房地产泡沫、国家政策银行滥用杠杆、国家信用破产、最高决策者颀颀无能而引发的多重账本危机：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家庭。随着大面积的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破产，出现债务-通货紧缩的怪圈。类似的危机让日本停滞三十年，日本政府利用国家账本帮助修复企业账本，终于让日本经济看到曙光。2008年金融风暴给美国带来恐慌，美国两党、总统、国会合力动用上万亿美元挽救了银行。但中国中央政府即便在经济顺风时期也滥用赤字财政，到危机降临时又提出中央政府不兜底、“各家孩子各家抱”，以致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快速走出陷阱、或像日本那样最终走出陷阱。中国私营企业、新兴中产家庭将面临金融危机的残酷结果：天量的财富会短时间内化为青烟，但债务永远不会消失。相反，由于资产缩水、信誉破产，利率还会增加，债务必然飙升。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更会伤害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铁（路）公（路）机（场）”的基建投资难以收回成本、消除债务。这将是全国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其社会、道德、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但中国经济危机并非只是习近平集团反动的结果，它也是对反动的反动。从中世纪末期勇敢的哲学家奥卡姆提出“剃刀原则”修理繁琐的经院哲

学，到当代卡尔·波普尔提出了“自由主义剃刀”，代表公民社会、市场体系的自由民主学说，从未停止过对专制思想和治理体系的削弱、消解。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重归毛主义，寡头集团暴发户倒行逆施，带来了国际资本和国内私营资本的反应和回击，逃资走资、脱钩、去风险就是结果。当年邓重启改革开放就是要放低党国的身段，向资本、企业家鞠躬，从而获得提升国民经济的机会。而习“平视世界”的傲慢和对资本的迫害，让中国进入了去投资的新时代——2023年中国首次出现了25年来的外资赤字。

中国有可能摆脱这种危机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吗？这必须看中国国家政权内部、社会各阶层如何反应，自由主义的剃刀能否成功逼迫党国剃刀的投降。如果习近平的专断能够被终止、自由民主宪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信誉能够得到建立，中国经济还会有新的生机。否则，超稳定的新极权体制可能让中国人发展的机遇转瞬即逝，并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翻车的国家随处可见。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后遭遇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至今还未逃离陷阱。当然，千年停滞、文明死亡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盖思德（Roger Garside，前英国外交官，《中国政变》作者，本刊顾问）：“在一个国家中，当社会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但政治体系却迟迟不作出相应调整时，革命就孕育而生了。”戈德斯通在《革命简论》（*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的话，正是现今中国的写照。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深刻，但政改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环境和结构的变化。政治体系并没有“相应地”做出适当反应，相反，为了防止政治变革，当局停

止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这种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不协调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动摇了自1978年以来维系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种社会契约，即“我接受你的统治，但作为交换，我要经济上的繁荣”。如今，这种契约似乎已失效。

更严重的是，这种全面而强大的政治体系逐渐暴露出其弊端，表现在经济、道德、社会、宗教和环境等诸多方面；而且，中共显然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无能侵蚀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虽然中共仍在政治上继续控制国家。共产党的合法性本来就是建立在政绩绩效上，而非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社会状态正从稳定的均衡状态转变为不稳定。戈德斯通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微小的混乱也可能触发更大的动荡，甚至推翻现有政权。这种转变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家庭将 70% 以上的积蓄投资于房地产，现在却遭受了灾难性的资本损失；20% 的城市青年失业，更多的人选择了“躺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以至于国内维稳开支超过了对外防御。

回顾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对外界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多重挑战。当时，此番言论在海外中国专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困惑和讨论。他所列举的经济问题，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并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温的警告现在被广泛接受为完全合理的。

在拙著《中国政变：自由的大飞跃》中，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想强调，触发革命的最有可能的途径，恰恰是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崩溃并非周期性波动，且没有复苏的迹象。地方政府一直从土地出让中获得40%的收入，现在这一部分收入的丧失导致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陷入破产状态。朱利安·加兰（Julien Garran, *Wickseil's Revenge*, 2023）揭示了令人担忧的现实：中央政府无力挽救这些地方政府，因为问题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控制范围——他估计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另外，政府也无法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这一危机，因为这将严重削弱人民币的价值。

目前，地方政府正依赖庞氏骗局来维持运营。一旦这些方案不再可行，地方政府将不得不裁员、关闭服务和终止基础设施项目；对持债人违约；银行存款者将损失存款；地方政府融资产品的投资者将面临资本损失；依赖地方政府融资的企业将倒闭，失业率将大幅上升。失去存款的人们、损失资本的投资者、失业工人将陷入绝望，愤怒的情绪将滋生动荡。甚至军警和安全部门也可能因为失去积蓄而失去抵抗意志。

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容忍专制体制的人民，将不会容忍一个使其重回贫穷的体制。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长期认同温家宝观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既得利益精英将意识到，若要保护他们剩余的财富和权力，若要拯救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领导一场政治革命。他们将动员愤怒的民众推动体制变革：引领一场政治革命，号召以自由媒体来问责政府、以独立司法来捍卫人权，并确保军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而非某个政党。（余浩风译）



李少民（美国欧道明大学管理学系主任、讲座教授）：中共把中国作为“举国大公司”管理。中共是管理层，总书记是总裁。各个部委是职能部门，如国安部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争取外资、延揽人才。宣传部是公关部。中国所有企业，或是它的部门（国企），或是合营公司（私企）、加盟店（外企）。和中共关系越近（国企），特权越多、自主权越少。反之亦然（外企）。

老百姓就是举国公司雇员，不得批评总裁，不得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形同内部流通券），不能自由迁徙。他们的居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司的宿舍，没有完整的产权。

举国公司的战略（中国产业政策）是：首先确定国家优先发展行业，然后把这些行业保护起来不让外资竞争，扶植本地公司，国家帮助他们取得技术，然后运用举国之力，快速发展这些行业。中国市场大，本地公司可以很快的取得经济规模和成本优势。一旦技术成熟，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国家就鼓励它们走向世界，成为这个行业最大供应商。在这个战略下，“举国大公司”在汽车电池、太阳能发电和高铁等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

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管理，有很多优势：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灵活、反应迅速；在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中，中国的企业又可以像政府一样，有巨大的资源和国家情报机构支持。

在应对宏观经济变化时，举国大公司的特点是权力集中在最高层（总书记）使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有效地动员所有资源、单位和人民。如果说

这是它的优势，那么它以下弱点。首先，采取积极或保守政策完全取决于CEO的偏好，以及他如何确定举国公司不同部门的优先——总部（党中央）、下属单位（地方和公司）或员工（老百姓）。在2008年经济衰退时，中共优先考虑支持地方和老百姓，因此向经济注入了4万亿元人民币（6660亿美元）。在2023年经济衰退时，习政府对向地方、企业和人民提供刺激措施没有兴趣，而是把保护总部（即党国政府）放在首位，这从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求“稳”中看出。

其次，在这高度集权组织中，下级必须揣摩高层意图，才敢提出解决方案。在不了解总书记倾向情况下，下层提议很有可能触礁，而这将使他们失去多年积累的级别待遇，甚至入狱。故没有顶层明确指示，鲜有人献计。

另一方面，一旦顶层表明意向，下面会将其逐级放大，变成政策海啸，导致过度措施。这时候总书记很少表态。因此，举国公司对新情况找解决方案低效，因为这需要不同方案竞争，而这正是集权缺乏的。比如在处理新冠病毒危机上，由于最高领导层决策错误，导致了三年清零封城，造成经济衰退和举国公司各级从上到下信心丧失。而现在面对经济衰退，最高层的反应和一个公司相似：首先保护公司总部，将公司（政府）负债和支出保持较低水平，号召员工（中国居民）共度难关，但不肯“放水”帮助地方和企业以及员工。这样很难让人们恢复信心。

乔山（笔名，中国大陆经济学者）：未来中国，经济长期衰退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是大概率事件。然而，即使经济危机为中国体制转型带来契机，民主转型也仅仅是四种政治可能之一。经济危机时期，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野蛮生长，四种政治力量可能迅速崛起：

第一种、改开派

近年来被边缘化的改开派，会把经济危机归咎于官方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由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历史性改善和提高，回归改开路线，在官僚集团和民间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一旦政治高压松动，体制内具有改开思想的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很容易从隐蔽变公开，迅速成为有组织、有纲领、并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力量。

第二种、马克思主义原教旨

他们会把经济危机归咎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归咎于资本家的剥削和西方阴谋。由于中共70多年来的灌输，这种主张很容易在经济危机中的生活窘迫人群中产生共鸣和认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危机和思想论战中，“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等原教旨大本营，都展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

第三种、极端民族主义

在独裁者继续执政的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会成为转移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危机的首选。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官方刻意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以国家统一和抵御西方封锁为借口，可以轻易实行战时经济、配给制和各种经济管制，保障战争机器运转，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从而转嫁或消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四种、民主力量

在经济危机中，希望通过废止极权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方式解决经济危机的政治力量，也必然蓬勃兴起。

可以想见，在经济危机伊始，由于路径依赖，由于民众的直接诉求是民生而不是民主，由于民主力量的政治动员能力成长速度远低于其他政治力量，民主转型会成为以上四种政治可能中非常靠后的选项。这并非是对中国民主转型表示悲观，而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与西方的经济危机不同，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极权体制引发的社会总危机，极权不除，民主不立，这种经济危机无法消除。

但是，这种民主转型的必然性，只有在其他政治可能碰壁时，才能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这就要求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要更多地致力于对于极权体制的批判，致力于对极权体制与经济危机因果关系的揭示，致力于对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关切，致力于政治动员能力的建立。

如是，民主转型将在以上四种政治可能中最终胜出。